

俄共(布)“十三大”文献选编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

苏联问题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三月

俄共(布)“十三大”文献选编

俄共（布）“十三大”文献选编

这个文献选编译自《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这本记录全书共约五、六十万字。我们从中选译了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加米涅夫的“关于国内商业和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的部分内容。

党内争论在“十三大”过程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为了反映这一情况，我们选译了克鲁普斯卡娅、苏瓦林，以及反对派的两个主要人物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发言。今天，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读读反对派的申辩，对我们了解和分析当时俄共党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许会有所裨益的。

这个选编完全是匆忙赶译出来的，未及在译文上作细致的推敲和加工，加之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尚祈批评指正。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苏联问题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一、季诺维也夫 中央政治报告.....	1
二、加米涅夫 关于国内商业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	79
三、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	89
四、苏瓦林的发言.....	92
五、托洛茨基的发言.....	95
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发言.....	114

中央政治报告

季诺维也夫

第二次全体会议

5月24日下午

加米涅夫（执行主席） 现在宣布开会。我们转入第二项议程：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报告。

季诺维也夫 ……

过去一年的总结

我们在做总结时，对这一年的工作，无疑是应予以肯定的。至于肯定多少，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的事业在前进，——这是不会有争议的。总结的这一年，将打上表示哀悼的黑边框，载入我党和国际革命的史册，因为这一年，我们失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然而，列宁的事业，也就是全党的事业，在这一年里却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我们大家无疑都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一年，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充满着各种事件。它是从寇松的最后通牒²²开始的。如今，你有时会忽然发现自

已在想：整个寇松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仿佛是二、三年前的事，其实，它就发生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之后。

“十二大”以后，中央所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这个谋算极广的寇松最后通牒。寇松大概并不排除或发动新战争，或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连一些大名鼎鼎的白俄首领们，在赫赫有名的白匪报纸《俄罗斯思想》²³上，也是这样评论最后通牒的。颇有名气的立宪民主党人奥尔登堡，在最后通牒发出后的三个月左右，直言不讳地写道：“英国最后通牒所带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可见他们确是存在过极大的幻想的。他们曾有可靠的根据，认为英国可能采取重新直接出兵这一步。但那又怎么样呢？以寇松最后通牒为起点的一年，却由六个资本主义大国在外交上相继承认而告终。

在这期间，近在眉睫的德国革命吸引了我们。我们一度觉得已经处在它即将来临的前夕了，而只是到后来，才发现德国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他们不得不作暂时的退却。

我们随后又看到，不仅在汉堡²⁴，而且在克拉科夫²⁵、索非亚²⁶以及保加利亚其它很多城市，乃至欧洲的各个角落，都爆发了武装起义。按我们的意见，应该把这些起义看成正是国际革命的新浪潮在开始。

我们同样也看到，去年夏天由真相早已大白的销售危机²⁷和某些罢工等问题所引起的重重困难。那时有些机会无疑是被错过了。同志们，在党内生活方面，我们经历了众所周知的动荡。我指的就是那次争论。在争论期间，党在饱尝苦头之后，给自己得出了某些结论。最后，我们还开展了为

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对这一运动的意义，是决不应低估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报刊上进行了阐述。

它的不可估量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志们，我感到我们还是没有充分估计到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全部重要性。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里边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们党的成员，大体上还都是我们在十月革命前夕和在十月革命中从工人阶级内部吸收来的，跟革命前的相比没有变化。不错，1919年举行的征收党员周²⁸，给了我们一批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但是，只是到现在，我们才能成功地巩固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和有机的联系——不仅和它的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我的看法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此。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抱怨说，这一年是平淡无奇的：它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毫无例外地充满着大事的年份，而且可以无需抢先来说，在一切领域里，我们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就。

诚然，这是在失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而我们不得不在一种全新的形势下举行这次会议。

“时间”因素未能被我们充分估计

作为革命者，我们不能只看到今天，而且还要展望未来，因此想就整个革命形势的问题稍稍谈点看法，这也是很自然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过：“光阴在飞逝”，但并不象我们所希望和曾经期待过的那样迅速，——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我认为，同样无可争辩的是，我们为世界革命的发展所选定的道路和方向，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有时，一些特别急躁的同志们（而他们往往并不是一些最差劲的布尔什维克）向我们指出这样那样的缺点，抱怨我们步子走得太慢，没有以特快列车的高速前进，反而像爬行一样，因此感到愤怒。于是，我劝他们回顾一下，我们当初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时，起点是什么样的。同志们，我建议你们不妨读读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草的、起着代表大会作用的1917年4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还在那个时候，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名提纲和他的《远方来信》之后，我们就确定了党在革命中应走的道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实行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时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²⁹

这一决议形成了一个纲领，它可归结为：土地国有化，国家对银行、保险机关和最大的辛迪加——大致像糖厂主的辛迪加、五金公司、煤炭公司等实行监督，课征累进所得税，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参加调节经济。其中甚至连对外

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也还没有提到。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纲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这里发给了你们一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值得纪念的精装本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在1917年9月就已脱稿。当时惟独只有列宁一人感觉到了十月革命的征兆。那时他拟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纲领呢？银行国有化，辛迪加国有化，取消营业秘密，对工业强制实行辛迪加化和加以调整。仅此而已。不言而喻，那时他和全党都知道，这些措施一贯彻，将会促使我们继续往前走。总之，在九月，当我们未来的道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已经是十分明确了的时候，我们党所拟定的经济纲领，实际上还是相当温和的。人们的胃口是越吃越大的。自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胃口也是一样。显然，无产阶级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应该彻底改革自己的纲领。在伟大的人民运动的浪潮中锤炼出来的这一纲领，应该表达出蕴藏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最底层群众心中的愿望。胃口越吃越大，——于是，我们在逐步提高自己的要求，并已把它列在你们都已知道的那个纲领中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那是因为我们遭到了象我们去年夏天所见到的那些挫折，在我们的某些部门——比如，国内商业部门（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它），——情况不妙，象列宁经常所说的机器运转不灵，需要进行改变，或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要有预见和相应的远景规划。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决不意味着象有些同志去年夏天觉得的那样，革命即将破产，我们已大难临头。这种情绪在争论期间是很明显的，而这是党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最诚实

的反对派流露出来的。

当需要在某一方面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就必须牢牢地把握住自己。胃口越吃越大，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那些在七年前存在的客观困难，就是现在也应该时时引起我党的注意。

我们对革命发展的客观趋势所作的估计，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对“时间”因素我们估计得不完全正确。对这一点我们现在是非常清楚了。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即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际，甚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一系列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的问题，是一个只需二、三个月就能定局的问题，那时在我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大家都在以小时计算着德国和奥地利事态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显然是错了。但是，同志们，幸亏我们大家在两个方面对“时间”因素都估计得不完全正确。我们不仅在估计革命可能到来的问题上，而且也在革命可能退却的问题上，都估计得不正确。那时我们认为，首先，既然我们夺取了政权，那末明天就可以去放手发动其他国家的革命；其次，如果革命万一没有成功，那么我们作为一次孤立的革命，作为一个自行其事的革命国家，就不可能支持下去，并终将灭亡。

我们对“时间”因素的估计是不对的。我们象是一支初出茅庐、未经战阵、完全新建的军队——一支全部由新兵组成的、未经一次战斗的军队。因而无论是进攻的规律，还是退却的规律，都掌握得不好，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律，认识得也不清楚。

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事态表明，世界革命

的问题不是一个三个月，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事态也证明，看来似乎是孤立的第一个革命，也能够单独地坚持得比我们原先所想像的时间要长得多。

就这样，我们在对待期限问题上，现在学得比从前更现实得多了。

我说，看来似乎是孤立的革命。我们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孤立。诚然，目前只有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每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都有我们的力量在成长。难道当寇松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刻，我们是孤立的吗？难道英国工人阶级——世界上最温和的工人们——在反对寇松最后通牒上，没有起到相当显著的作用吗？不正是他们向寇松及寇松分子们表明，英国工人不要战争，也不允许发动战争吗？难道这是孤立吗？我们曾经受过孤立，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的，那就是还没有一个取得胜利的革命可以给我们以直接的援助，但是，我们在每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日益壮大的强有力的同盟者。

我们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前景问题的。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应该看到，现在我们，而且不仅是我們，连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们，都学会了更加清醒地和现实地看待时间因素了。比如，我们的德国同志曾有个时候就认为，俄国革命的寿命问题是以几个月来计算的，如果他们不加快革命的速度并前来援助，那苏联将会灭亡。现在很明显，我们已经赢得了若干年的时间，并且即使革命的速度不加快，即使我们依然是一个孤立的苏维埃国家，我们将来还会赢得许多年的时间。

我们的中央忠于列宁的遗训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我们所总结的这一年，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以臭名远扬的寇松最后通牒为开端的。不久前，我们一位有声望的外交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我就去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交换意见时，告诉我说：“单凭我们能够巧妙地应付寇松最后通牒这件事，单凭我们用来对付他的策略，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外交官‘名垂千古’。”

我觉得，这未免太言过其实了。我期望的是党和她的领导机关将以更重大的事业，来使自己流芳百世。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滴真理的。我们在对付寇松最后通牒上，随机应变的战术确实运用得不坏，给尊敬的勋爵留了点面子。我们等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过了几个月，就有一系列国家纷纷在外交上完全承认我们；过了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在发展，我们的力量在增强。由于我们运筹帷幄，我们得胜了。

不错，我们忠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遗训的党中央，就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也确实善于在困难时刻找到出路。为此，党及其领导机关也许不应该受到如此大张旗鼓的称赞，但毕竟还是应该受到某种称赞的。

同志们，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大国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变化，都确实证明了我们在这一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假使你们，比方说，提出我们国内政策方面的问题，举出诸如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以及那些对我们来说如同遇到了最危险的暗礁一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大家立刻会有这样

的感觉，我们在这些领域里，已经变得更为强大了。

请回顾一下我们实施新经济政策的1921年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民问题说过些什么呢？在实行实物税法的时候，他曾说过：必须“今晚就把我们对农民所作的让步，通过无线电进行广播，以便做到家喻户晓³⁰”。那时候，有关改善我们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是以小时来计算的。如今，在对待速度问题上，我们从这件事上也得到了些启示。就在我们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讨论农民问题。即令现在，这仍然是一个相当迫切而又复杂的难题。可是，目前已不必以小时来计算问题了。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多少较为牢固的时期，并且已经有时间来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东西了。

民 族 问 题（略）

我们是否已从预备班升入一年级

我们面临着组织和领导我们苏维埃经济的新任务。下面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此问题所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了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这是不大的、局部的，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在这新‘科学’的领域里，就要读完预备班了。”³²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的总结报告的

任务，我们大家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过去一年在经济领域里，我们是否已从预备班升入了一年级，并正从一年级准备升入二年级。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领域里的主要议题。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又教导我们说：

“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都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⁸³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能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冷静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限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⁸⁴

你们大家当然都是记得这些话的。我想，我们大家的第二个任务是要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扪心自问：“好吧，就算我们已从预备班升入了一年级，正在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可我们又怎样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谁战胜谁’呢？我们长入何方？我们一直关注着的繁荣景象是否正在出现？它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是在为我们奠定基础呢？”我考虑，我们党中央的报告，其实就可归结为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此作出详尽的回答，在经济方面要说明：是否已从预备班升入了一年级，又将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在革命的前景方面：谁战胜谁？我们长入何方？事业向何处去？时间于谁有利？我将对这些问题尽量作出力所能及的回答。

我们的乐观主义和三大考核

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中央内部倾向于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积极和肯定的回答。我们不想陷入过分的乐观。轻率的和漫不经心的乐观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特点。如果说我们有时需要更多地强调我们的光明面，我们的成就，我党的功绩，那只是因为蔓延开来的、无根据的灰心情绪有着巨大的政治背景，并有造成政治上的危险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类涉及灰心、悲观和乐观情绪的问题，不单是一个心理问题，而经常还是个政治问题的缘故。我们全党及其领导机构的基本情绪和情绪的基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那是从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事业正在赢得胜利这一意义来说的。然而，不言而喻，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是盲目的乐天派，认为万事大吉，没有作自我批评的情由了。有这样的情由，但也应该记住灰心的危害。不久前，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遗作³⁵。他在此文中直截了当而又明确地谈到了“灰心的害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是针对某些信件的作者们而言的。这些散布灰心情绪的信件在1922年起了恶劣的作用，而有人在1923年又利用它进行犯罪活动。我们中央认为，过去和现在都确实不存在产生灰心的任何理由。

我们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不知不觉地要接受三项最严肃的考核。第一项考核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来自我们的敌人。你们曾否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是怎样对经济工作人员说的。“现在考核你们的是市

场，不是中央监委，而是市场，请务必达到考核及格”³⁶。当前，在这一领域里，考核我们的仍然不是中央监委，——中央监委也许要宽容得多，——而是西欧资本家们。究竟他们在外交上承认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仔细地从各个方面对我们进行考核、试探、掂量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对我们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考察。光一个美国，通过美国救济署³⁷就抛出了几百万美元，企图从各个方面来监视我们；接着又有英国人、德国人等等到我们这里来考核我们。

既然他们经过认真的考核和试探之后，得出了应在外交上承认我们的结论，这就是说，他们确认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和不可动摇。

第二项考核是币制改革³⁸。这是一个与经济、与新经济政策、与我们这里的新生资产阶级的敌对情绪有联系的考核。这同样不是来自一个友好组织的、来自中央监委的、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考核，而是市场进行的考核，是对我们的经营管理本领方面的考核。在此过程中，敌对势力曾经抬过头。我还不致于这般乐观，认为这一考核已经是最后了。同志们，不是的，在这一方面还会有困难，但是，已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赞许的。

末了，第三项考核，这个考核确实是友好的，同时又是群众性的——这就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在这件事上，考核我们的是工人阶级，是千百万人们。你们知道工人阶级给我们选送了大约二十万党员。全体工人都对我们进行了考核。这是一次深入工人阶级最下层的、最好的、群众性的政治考核。这第三项考核也同样考出了我们的好成绩。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我党和中央的政策在这一年里所接受的所有这三项考核，给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说明了记住灰心的害处，的确是很重要的。

当然，漫天的乐观是毫无益处的。我们将更着重地指出自己的阴暗面，以便改正错误和推进工作。布尔什维克从来就不是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人。但是，我们有一切理由使全党的基调，我们全部国际与国内政策的基调，成为乐观的，信心十足的，而决不会使它受不健康的、灰心失望的情绪所左右。这种情绪在去年已使我们的一小部分同志成了它的受害者。

国际形势

现在我来谈谈国际形势。我们当前的国际形势，从许多方面来看，完全是新的。它如同一个万花筒，变幻莫测。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就必须对它作相当详细的研究。恰好在最近几个月，我们亲眼看到了它象活动布景似地在演变。就是现在也还没有窥见其全貌，而它本身也还没有基本定局。

同志们，我认为首先必须注意到，——现在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国内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应该牢牢记住。有时党内流露出这样的情绪，觉得对外政策好比是盛在特殊盘子里的一道名菜，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别的方面真都错了，唯独在这方面一切都是正确的，”——非党记者列日涅夫是这样来表述此种情绪的。同时，我们现在必须特别记